

《周易》的哲学精神

——吕绍纲易学文选

吕绍纲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《周易》的哲学精神

——吕绍纲易学文选

吕绍纲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《周易》的哲学精神: 吕绍纲易学文选 / 吕绍纲著.
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5. 1

ISBN 7-5325-3913-X

I. 周... II. 吕... III. 周易—研究—文集
IV. B221. 5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01750 号

《周易》的哲学精神

——吕绍纲易学文选

吕绍纲 著

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、发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江苏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 × 1156 1/32 印张 14.875 插页 2 字数 360,000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100

ISBN 7-5325-3913-X

B · 474 定价: 36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0513—3349365

出震而盖，象伏而辟，宗人固中也布，义舍内土而进其刚，”天之言雷是不期往四十六之《易》又，意田之”建其雷”人圣古十志而目其，意以象立以河，往四十六卦入圣。象数有其非出，卦辞爻辞则又以，又之破音则事也夫象之爻使限个以，象辞于古有具由而成。故之服晋土而进衣素而世，系关之固互世界世前位已界世出知言是，世引得位是不味，为引而音雷其是，衣衣世思之《易》。世思则固的”意数象”指出是”一”意则空是不味，代而的义不而目之皆《易》升。”金主人”一衣衣，心科而学言是则，不民

序

《易》之为书，实乃千古之谜。卦辞爻辞，古奥艰深，好学深思者孜孜于《易》，以穷其一生，亦未必尽通其辞。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吕绍纲教授师承金景芳先生治《易》多年，才学宏肆，析理精审，堪称海内易学大师。近应上海古籍出版社之请，将其论《易》之散文集结成册，内含“我与《周易》”、“《周易》之义理”、“历代易学研究”、“韩国二李易学研究”、“《周易》与史学”等方面的内容，共二十三篇。继先生之《周易全解》、《周易阐微》、《周易辞典》之后，此书之于易学，为另一重大贡献。

先生此书，廊庑阔大，涵盖甚广。先生肯定《周易》一书，孔子依经作传，以传传经，经传一体，不可或分。《易》虽事涉卜筮，但自孔子赞《易》之后，《易》已成为中国形而上学之柱石，孔子实开《易》义理之学之先声。先生治《易》，亦首重义理，不尚象数。先生认为古易之作，其目的在“神道设教”，其思维方式超越语言符号之上，成为一圆融思想体系，其核心在提供一贯通天人的人生论。又《周易》以八卦（乾、坤、震、艮、坎、离、巽、兑）为本，而八卦无一不以“自然之天”为其所指。绍纲先生从金景芳先生之说，认为中国人“自然之天”的概念始于尧，在此之前，中国实行“火历”（依“大火星”制历），不可能产生天的观念，因此《易》之作不可能早于尧。是故“包牺作卦”之说，未可尽信。而《周易》的“自然

之天”，既具形而上的含义，亦为中国人宗教祭祀的对象，盖可谓出于古圣人“神道设教”之用意。又《周易》之六十四卦既不是语言符号，也非具体物象。圣人借六十四卦，所以立象尽意，其目的在由具体达于抽象，以个别卦爻之象表达事物普遍之义，以反映现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相互间之关系，进而表达形而上普遍之道。如此《周易》之思维方式，虽具语言的形式，却不是分析论述；虽有赋比兴的成分，却不是空洞想象，而是出诸“以象观意”的圆融思维。

另外，周易哲学的核心，实为一“人生论”。作《易》者之目的不但在仿真宇宙自然的规律，且在为人设计处于特定时空情境之下最佳的行动方案。人之所以有吉凶祸福、悔吝忧虞，无不出于个人之言行举止之后果。《周易》卦爻辞时时以戒慎恐惧，防微杜渐，代为人谋。是故清代焦循说《易》是教人寡过之书。绍纲先生进而指出，“易”本变化之意。《易》言变化，不仅明天道，也及于人事，其目的在教人“顺天应人”。《系辞传上》说：“明于天之道，而察于民之故。”“天之道”是自然规律，“民之故”是社会生活规律，《易》的作用便在教人一面提高主体的道德修养，一面适应客体的自然变化，以其达到天人合德、主客统一的境界。绍纲先生并认为这里“时”的概念非常重要；自然变化，迁流不息，便是“时”的意义。《周易》贵中贵正，更贵“时”。日月代明，四时代序，显示人们对客观自然时序的认识，也显示人们对于时序的主观意识。《周易》中一再言及“时用大矣哉”，“时义大矣哉”，便在提醒人所作所为，必须“与时偕行”，以顺应客观环境的变化。至于道德修养方面，《周易》特别提出两个层次的理想人格。较低层级的是“君子”，较高层级的是“圣人”。“元亨利贞”、“终日乾乾”都是君子之德。“聚学辨问”、“居宽行仁”是为君子之行。“君子”之上为“圣人”。“圣人”明于天道、察于民故，既知变化之道、又知神之所为。故《易》有之，圣人极深研几，“通天下之志、成天下之务、断天下之疑”，也便是“能说诸心而研诸虑，定天下

之吉凶，成天下之亹亹者”。由此可见“君子”与“圣人”之别在事功上。君子重崇德，圣人重广业，皆所以反映儒家一贯的“淑世精神”。至于《周易》中有关君子与圣人精神修养的细节，绍纲先生书中所言甚详，这里无庸赘述。

先秦易学方面，绍纲先生加意区分《易传》思想与道家思想不同。或有以《易传》思想近乎道家思想者，先生对此一谬论反复勘核，予以批驳。或有以《易传》与老子均持动态的宇宙观和无神的自然观，二者之天道观宜属同源。且《易传》所谓“《易》有太极，是生两仪”与《道德经》称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”若合节符；又二者均具备辩证思维模式，其思想系统应当相同。绍纲先生指出《易传》与老子的天道观和自然观虽有相似之处，但在回答宇宙终极根本的问题上，却截然不同，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。《易传》所谓“太极”，是天地未分之前、浑然无别的状态，在“太极”之前之上，别无他物。如果《道德经》中说“道生一”的“一”是“太极”，那么在“太极”之上，还另有一个“道”。《庄子·大宗师》中说道“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”，可为左证。又《道德经》中曾明言“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”，“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万物之母”，更可见道家主张在“有”之上，还有一个“无”，这一点与《易传》的看法是绝然不同的。而老庄之道，守柔处下，无为不争。所谓“无为之谓道，舍之之谓德”。较诸《易传》以利用安身，穷神知化为德，迥然不同。要之，道家持一“文明退化论”，以文明越进步，道德越沦丧；《易传》则持一“文明进化论”，以文明越进步，道德越提升。是以老子说“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”时，《易传》则反复劝人进德修业，日新其德。再者，虽然《易传》与老子均以“天”为“自然之天”，非“主宰之天”，但老子心中没有上帝鬼神的地位，而《易传》却肯定鬼神祭祀之事。以《易》之目的在“神道设教”是也。而老子只求“小国寡民”，自然无为，无意于“神道设教”。至于说《易传》的辩证思维来自老

子,更属无稽之谈。《周易》与老子虽然多言对立的概念,强调阴阳相求后统一的过程,但《易》的辩证所重者在和谐统一,而非矛盾斗争。老子的辩证含有“反者道之动”、“弱者道之用”的原理,认为事物的正面含着反面的意义,肯定中含着否定的意义,甚而正面肯定的事物必须透过其反面否定的事物表现出来。所谓“正言若反”、“大直若屈,大巧若拙”,这一类的意思。《易传》则不然。《易》以阴阳道化,《易》的辩证思想是建立在阴阳变化的基础之上的。《系辞传》上总强调“一阴一阳”、“刚柔相摩”、“分阴分阳,迭用柔刚”,旨在说明阴阳刚柔相反相成,旁通交感,不可偏执。因此《易传》既不守柔,也不守刚,颇异于老子的思想。又《易传》重时用,老子出世,二者各具特色,岂可混为一谈?

那么《易》与儒道两家,究竟有何关系?如何明辨其间的异同?绍纲先生明确指出《周易》与儒家属同一思想系统,老子的思想则可能渊源于殷《易》。无论《彖传》、《象传》,均显示儒家精神,鼓励人之积极、雄健、有为。而《彖传》言“神道设教”,讲究趣时应变,均与老子抱一守静的思想不同。再者《系辞传》不但重趣时,且明言求“事业”,所谓“化而裁之谓之变,推而行之为之通,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”,这与老子主张无为而治根本不同。若说老子的思想渊源于《易》,据绍纲先生推测这《易》不是《周易》,而是殷《易》。史称《易》有三易,夏曰《连山》,殷曰《归藏》,周曰《周易》。三部易书中,夏《易》已失传,殷《易》近虽有断简残篇的发现,但罕为人知,唯有《周易》行世。《周易》以《乾》卦为首,《归藏》却以《坤》卦为首。这可见于孔子言得《夏时》,以观夏道,又得《坤乾》,以观殷道。这《坤乾》正是《归藏》,足以反映殷人的文化特色。殷人重母统,故殷《易》以坤为首,而周人重父统,故《周易》以乾为首。汉人说“殷道亲亲,周道尊尊”,正是指这两种文化的特色。老子《道德经》五千言,常言母、牝、雌,强调柔弱、谦卑、居后,不能说是取自《周易》坤卦的精神,

应是出自殷《易》以坤为首的精神。

于宋易学和清易学,绍纲先生本着进义理、退象数的治《易》精神,肯定《程氏易传》之以《周易》为义理之书,对于朱熹之以《易》为卜筮之书不以为然。又先生对胡煦之反对卦变说,深表推重,于其象数派的立场加以宽宥。由此可见先生治学,宽宏而富有批判的精神。

在易史学方面,绍纲先生主张《周易》虽不是历史书,但有丰富的历史含义。如《系辞传》多处言及上古文明发展的重大事件,如衣裳、舟楫、服牛乘马、杵臼、弓矢、棺槨、书契等等的制作。《序卦传》则先有天地之后,继而有万物、男女、夫妇、父子、君臣、上下、礼义之说,显示《易传》具有社会演化的思想。《易》卦爻辞中,更充满对古代历史事件的隐喻或明言。此外,《周易》也曾影响中国史学家,绍纲先生认为司马迁曾将易学思想融入史学之中。从孔子易学之传承见于《史记》中可知,史迁与孔子易学关系匪浅。据云杨何曾传《易》于司马迁之父司马谈,可见司马迁也得到孔子易学之传。又《史记》中曾有孔子晚而喜《易》之说,与最近马王堆出土帛书所记载相同。可见史迁对孔子赞《易》,知之甚稔。而司马迁作《史记》也接受了《易传》所言文明发展变化的历史观,他自道其作《史记》的目的在于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。这里“通古今之变”,充分反映了《易》重时变的观点。除史迁之外,绍纲先生又介绍史学家章学诚亦曾以《易》为史,而易学家胡朴安也曾以《周易》为记事之古史,而以史解《易》。他赞许章学诚将易理融于史学的作法,却对胡朴安的穿凿附会多所批评。

最后,据云绍纲先生的师尊金景芳教授先世为韩国人,他对韩人素感亲切。近年来绍纲先生曾多次赴韩讲学,参加国际学术会议,向与韩人友善,或因此措意于韩人易学。本书中绍纲先生特别介绍 16 世纪两位韩国儒学大师李退溪和李栗谷的易学思想,他们

虽都深受朱熹理学与易学之影响,但却对朱熹以《易》本义为卜筮,不表赞同。退溪先生的易学强调进修践履,并采“进义理、退象数”的研究态度。他对《程氏易传》的重视,甚于朱熹的《易本义》,便是因为《程传》将《易》看作是义理之书,而《本义》却将《易》视为卜筮之书。退溪曾研习过朱熹的《启蒙》,认识到《易》中也有数理、象数的成分,但他始终以《易》为教人修养德性、学为圣贤之书。绍纲先生并举五例说明退溪的易理思想:(一)学《易》可以无大过;(二)《易》贵时中;(三)《易》以往来消息为渐变转化的过程;(四)《易》贵谦德;(五)《易》以义之和为利。凡此种种,可见退溪对于《周易》理解之深度。退溪对于朱熹以“太极是理,阴阳是气,理先气后”的说法予以赞同,栗谷先生则不然。他虽同意“太极是理,阴阳是气”,但却强调“理气不离,离理无气”,且主张在阴阳循环之中,太极无乎不在。李栗谷是继退溪之后,韩国另一大儒,他的易学思想也是承朱熹而来,且总以易学在日用平常之中,这是他以《易》为实学的主张。绍纲先生以两点说明栗谷的主张,一是学问贵在贯通义理,而不在记诵词章;二是学问的根本在实行,不可徒托空言。学以致用,务实践履,才是真学问。本着实学的精神,栗谷的易学着眼在应用,强调“穷变通久”、“乐行忧违”,将《易》的思想用在因应时变与出处进退之间。本着实学的精神,栗谷用《易》,重在穷理知变,不重占筮卜卦。对于象数派的说法,予以严厉批评。赞誉邵雍既明易理又精易数,接受《程氏易传》,但对《朱子本义》则有所保留。总之,绍纲先生对两位韩人易学均十分推崇,认为他们虽受朱子学说的影响,却能明辨《易》义理与象数之别,而知所去取。

会上 总上所说,读先生之书,处处深感先生用力之深,治《易》之诚。于《易》之作、《易》之理、《易》之辞、《易》之象、《易》之史,无不反复推敲,务求翔实。先生之易学可说继承自孔子、王弼、孔颖

达、程颐以来之义理派,对于卜筮象数之说,则多所批评。尤其先生对京房、荀爽、虞翻、俞琰、李挺之、朱熹等人的“卦变之说”,与《系辞传》成卦之说渺不相干,是为的论。又先生认为《周易》是儒家思想的宝典,不得与道家老庄的思想混为一谈。以上先生这两项易学的基本立场,个人深表赞同。个人从程石泉师学《易》,另有浅见,今就绍纲先生观点加重涂描几笔,使之更加浓重,更加明显:《易》之为书,原为筮用,显示中国古贤重视机遇(chance),而不信机械因果决定论。就当代西方思想而言,重视机遇已是十分先进的思维。而后文王演《易》,孔子赞《易》,《易》乃成为中国人宇宙论的基础,藉以建立本体论与价值论的哲学宝典。《易》言宇宙创化原理,强调其“生生之德”。“太极”是宇宙创化的终极原理,由“太极”而“两仪”,由“四象”而“八卦”。这里“太极”象征宇宙未分阴阳的混沌状态,“两仪”象征日月,“四象”象征春夏秋冬,“八卦”象征八种自然现象,即天、地、风、雷、水、火、山、泽。其数由一而二,由二而四,由四而八,实出于数学上的必然性,其间并不含什么神秘之处。因此,八卦中的“阴阳”,或象征“日月”,或代表对立或对比的原理,不可与道家的“阴阳二气”之说混为一谈。准此,《周易》之“阴阳八卦系统”,与汉之阴阳家“阴阳五行系统”亦不相干,那么宋儒以理学释《易》,杂糅道教阴阳五行之说,更不足取。须知宇宙论仅言宇宙创化的原理法则,并不涉及宇宙实质产生的过程,前者是“cosmology”,后者是“cosmogony”(宇宙发生学),二者不可相混。然而程朱学派以“太极”为理,“阴阳”为气,显然是将道教的思想引入《周易》,导致易学步入迷津。本书发挥易理、阐扬易道、明辨易史,其贡献必将永垂后世,嘉惠学人。

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系教授俞懿娴拜手谨序于台中大度山

时序甲申初夏

序 二

吕绍纲先生是当代义理易学的大家，曾与老师金景芳先生合著《周易全解》，又著《周易阐微》，主编《周易辞典》，蜚声中外。这次将其散见于海内外各书刊的易学论文选编为《〈周易〉的哲学精神》，命我作序。作为学生，我既感荣幸，又觉惶恐。现将自己读书的一些粗浅心得汇报如下，望吕先生和读者诸君不吝指教。

吕先生此书，共选入二十三文，分为“我与《周易》”、“周易之义理”、“历代易学研究”、“韩国二李易学研究”、“周易与史”五编，基本概括了吕先生易学研究的各个方面，浓缩了吕先生易学研究的精华。这五编二十三文，都可谓精彩迭出，胜义纷呈，而我感受最深的则有五点：

首先是坚持义理治《易》的正道。“易学广大，无所不包”，从巫、史到孔子，从孟喜、京房、焦贛、荀爽、郑玄、虞翻到王弼、韩康伯、孔颖达、李鼎祚，从程颐、朱熹、邵雍到来知德、王船山、毛奇龄、李光地、惠栋、张惠言、焦循，从尚秉和、杭辛斋、薛学潜到高亨、李镜池、苏渊雷、金景芳，大家辈出，方法各异。吕先生少时即受祖父的影响，不信卜筮，只言义理。后从金先生问学，更系统地接受了金景芳先生的义理易学思想。所谓“祖父给我以始，金师助我以成”者即是。所以其治《易》能远宗孔子，近绍王弼、程颐，以传解经，坚守注、疏，并出以新意。放眼学界，《易》说虽繁，但金先生以

下,能高擎义理易学大旗,称得上义理易学代表的,非吕先生莫属。吕先生认为:“《周易》由天道说起,而其终极关怀在人间。《周易》的自然哲学毕竟落实在人文精神上,所以《周易》讲伦理讲道德。《周易》最令人折服的一点是它把人立于顶天立地的地位。人在《周易》中是主体也是客体,首先是主体。人是主体,且人本身就是目的。人为了完善自己才须修养,修养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。孔子讲‘古之学者为己’是也。这是《周易》人文精神之根本处。”因而“主张循义理派的路子研《易》”,“不赞成象数派的理论、方法。按象数派的路子研究《周易》,不合《周易》的性质,将使《周易》更加难以理解,迫使广大读者走上占卜迷信的道路”。这是吕先生治《易》的经验之谈,更是其成功之处。不管别人如何看,而我据自己治《易》的体验,是深信不疑的。

第二是认为辩证法的源头在《周易》。早在上世纪的40年代,金景芳先生在《易通》一书中就指出《系辞传》的“《易》有太极,是生两仪,两仪生四象,四象生八卦”与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说恰相符合,又说《系辞传》的“易,穷则变,变则通”符合质变与量变和否定之否定原理。到50年代,金老进一步论证《周易》一书贯穿着辩证法精神。吕先生继承了金老的观点,并有了新的突破。在1997年6月新加坡举行“儒学与人类文明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,吕先生发表了《周易——辩证法的源头》一文,提出:“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内的欧洲学者一般认为,辩证法最早产生于希腊,希腊是辩证法的源头。单就欧洲而言,这是正确的。若从全人类辩证法发展史的角度看,应当说:辩证法的源头在中国《周易》,不在希腊。”这一观点在学界激起了轩然大波。哲学界的主流学者提出黑格尔当时还没有出生,《周易》怎么会有辩证法?至于辩证法的源头不在希腊,而在中国《周易》,在他们看来,是想也不敢想的事。其实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”,辩证法可以“横看”,也可以

“侧视”，可以“远望”，也可以“近观”，完全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态。黑格尔可以有黑格尔的辩证法表述，中国人也可以有中国人的表述。我们不能说只有“横看”到的才是庐山，“侧视”到的就不能称为庐山，为什么就一定要说只有黑格尔的表述才能称为辩证法，《周易》和《系辞传》的表述就不能称为辩证法呢？只要承认辩证法不是黑格尔的专利，《周易》本经也有辩证法，回到哲学史上，我们势必就得承认产生于殷末周初的《周易》本经，确实早于希腊，说它是“辩证法的源头”，是完全有道理的。吕先生这一观点，说有凿破鸿蒙之功，实不为过。

第三是对《易传》道家说的批评。《易传》本为孔子及其后学解《易》之作。日人本田成之 1920 年代初提出《易传》与儒家思想，根本不合，而多取于老子。国内学者钱穆、李镜池、冯友兰、钱玄同、顾颉刚等抄袭其说，在二三十年代发表了许多《易传》属道而不属儒的议论。^①半个多世纪以后，陈鼓应为其道家文化主干说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，力主《易传》为道家系统的著作，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吕绍纲先生是第一位站出来与陈鼓应论战的学者。他发表在《哲学研究》1989 年第 9 期的《易大传与老子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》一文指出：《易传》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的道与《老子》“道生一”的道不同，《易传》的辩证法与孔子一致而与老子俨然两途，《易传》与《老子》有不同的思想渊源，“《老子》受殷易《坤乾》的影响分明较深，而《易传》与《坤乾》有着截然不同的思想内涵。它的思想理所当然来自《周易》古经，又与孔子及儒家学派一致。我们的结论只能是：《易传》与《老子》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，《易传》的思想骨干得自孔子及儒家，而与《老子》无关。《老子》思想可以上溯殷易《坤乾》，它绝不可能是《易经》与《易传》的发展中介”。1995 年，吕先生又发表了《论〈系辞传〉属儒不属道》，进一步论证：《系辞传》的道是儒家的道，不是道家的道；《系

辞传》的“太极”或“太恒”不是道，太极与道是属于两个层次的范畴；《系辞传》“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”乃道地儒家本色，其讲仁义，讲礼，讲知，讲文明进步，讲“知柔知刚”，全是儒家本色，与道家绝不相谋。文章出来后，陈鼓应难撄其锋，不敢正面对答，只好“顾左右而言他”。对于陈鼓应的《易传》道家说，后来周桂钿^②、我^③、郭沂^④、陈启智^⑤、颜国明^⑥等人都陆续写了批评文章，做了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。不管我们这些后来者如何各有千秋，但都程度不等受到了吕先生的影响。这应是不争的事实。

第四是对程、朱易学的评价。南宋以来，程朱理学并称，反映在易学上，程《传》和朱熹《本义》也往往并尊。吕先生继承了马一浮、金景芳先生尊程抑朱的思路，进而对程、朱易学做了精密的分析，认为朱熹学问承继程颐，在易学上却与程颐大相径庭。程颐作《易传》宗师孔子，接续王弼，绝不言卜筮。朱熹作《周易本义》倡言《易》本卜筮之书。程颐一生对周敦颐《太极图说》不置一词，朱熹作《太极图说解》，视《太极图说》如经典。程颐一向轻蔑邵雍的图书术数之学，朱熹视之为珍宝。程颐解六十四卦一从义理，朱熹解六十四卦以占卜为前提。程颐是纯粹的义理派，解卦虽不免有误时，但大方向始终不偏。朱熹解卦义理、象数、占卜兼顾，归根结底是重占卜、象数。因此主张“初学《易》者，于程朱应有所选择，宜以程颐《易传》为先，朱熹《本义》暂不读亦可”。这一认识，高屋建瓴地清算了程、朱易学的是非，了却了宋明理学的一笔“糊涂帐”，是宋易研究的一大进展。

从这一认识出发，吕先生又对韩国 16 世纪大思想家李退溪、李栗谷的易学成就做了新的评价。认为李退溪“易学功夫极深，至熟至精”，“主义理，于象数虽亦用力研讨，但决不耽迷，至于卜筮之事不言亦不为。由此观之，退溪易学与其说一承朱子，不如说更像程颐。可以说退溪是义理派易学大家”，又说“朱子说《易》为卜

筮作,退溪没完全相信。朱子说孔子《易传》有不合经文本义之处,退溪不以为然。朱子不希望学者读程传,退溪则主张读《易》把程传放在第一位。更为重要的,朱子在经传关系上,态度犹疑不定,而退溪则坚定地实行经传合观”。这是以对程朱易学的态度来论李退溪易学的高下。其论李栗谷易学也是如此。他认为栗谷用易重穷理知变而不重占卜;视汉代及其以后的象数学派为邪说,予以严厉批评;对程颐《易传》和朱子《本义》都有研究,而在实际接受上受程颐影响显然较深,对朱子的易学观点则有所保留。所以认定李栗谷所取的是“坚定的义理派易学立场”。这些分析遑论在国内易学界,就是在韩国,都可谓前无古人,振聋发聩,足以为治韩国易学史者法。

第五是对卦变说的否定。卦变说是象数派易学的理论骨干之一,金老当年曾给学生拟出《周易》研究的十个难题,卦变说就是其中之一。在金老诸门人中,吕先生研究卦变说虽晚,但成绩空前,值得大书特书。吕先生认为《周易》只讲卦之生成,不讲卦变。卦变说是汉人京房、虞翻及宋人李挺之、朱熹、俞琰等人逐步创造出来的。卦变是汉人所创众多易例中的一种,不能说互体、反对、旁通、升降等也是卦变。卦变说建立在对《彖传》上下往来内外终始八字错误理解的基础上,其要害是认为六十四卦生成之后卦体继续变动,继续相互生成,故卦变说是一个混乱的、错误的生成论体系。宋人苏轼、程颐及清人李惇未能从根本上批倒卦变说。在理论上彻底批倒卦变说的是清初胡煦的《周易函书》。胡氏发前人之所未发,用“体卦主爻”说解释《彖传》上下往来内外终始八字,至为正确。吕先生此论,是对卦变研究的一个总结,是易学史研究的一大突破,值得治象数易者深思。

吕先生既是经师,也是人师。我每有一点微小的进步,吕先生或写信,或打电话,总是予以鼓励、肯定。记得当年《周易经传与易

学史新论》稿成,吕先生就极力推荐,在“中国孔子基金会文库”学术委员会的专家评审会上予以高度评价。我到长春看望病中的金老,手捧书稿向吕先生索序,吕先生不顾自己也有病在身,一口应承,我刚从长春回到北京,就收到了吕先生寄来的序,感激之情真是难以言表。去年我刚在《周易研究》第5期上发表了《长安西仁村陶拍数字卦解读》一文,吕先生就打来电话,予以激赏。我写《周易经传十五讲》,提出了一些新观点,在电话里与吕先生讨论,吕先生非常高兴,索要书稿。看到书稿后,吕先生评价极高,要我允许他引用。这种奖掖后进、不耻下问的胸襟,每每给我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。我与山东大学的王新春教授谈及吕先生,他说他们山东大学易学研究中心师生们的评价也与我一样。可见这并非我一人的私见,而是学界的公论。

以上所论,只是自己读吕先生书的一些粗浅感受,所谓管中窥豹,挂一漏万,要详细了解吕先生的易学成就及其为人,我们还是读读吕先生的原书吧!

廖名春

2004年9月13日于北京回龙观新居

-
- ① 廖名春:《钱穆孔子与〈周易〉关系说考辨》,《河北学刊》2004年第2期。
- ② 周桂钊:《道家新成员考辨——兼论〈易·系辞〉不是道家著作》,《周易研究》1993年第1期。
- ③ 廖名春:《论帛书〈系辞〉的学派性质》,《哲学研究》1993年第7期。
- ④ 郭沂:《〈易传〉成书与性质若干观点评议》,《齐鲁学刊》1998年第1期。
- ⑤ 陈启智:《论〈易传〉的学派属性——与陈鼓应商榷》,《周易研究》2000年第1期。
- ⑥ 颜国明:《“〈易传〉是道家易学”驳议》,《中国文哲研究集刊》第21期(2002年9月)。

目 录

序一 俞懿娴	1
序二 廖名春	8

第一编 我与《周易》

我与《周易》研究	3
一、我学《易》有老师	3
二、与师合著《周易全解》	4
三、《周易》辩证法	6
四、《周易阐微》与《周易辞典》	7
五、分清义理、象数两派界限	12
六、关于朱熹易学	15
七、我的易学见解	16
我的易学观	18

第二编 《周易》之义理

《周易》的哲学精神	25
《周易》的人生论	42